



鲁迅研究书系

由中间 寻找无限

——鲁迅的文化价值观

王乾坤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7210.97 / 65

鲁迅研究书系

由中间 寻找无限

——鲁迅的文化价值观

王乾坤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鲁迅研究书系 ·

由“中间”寻找无限

——鲁迅的文化价值观

王乾坤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5 印张 5 插页 210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7—5419—5185—4/G·4465

(精装)定 价:30.80 元

鲁迅研究书系编委会

策 划/陈绪万

顾 问/王士菁 林 非

主 编/袁良骏

副主编/王富仁 阎庆生 郑欣淼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戈宝权 方 似

刘建军 李允经 肖夫田

余渊达 张 华 迟 珊

陈漱渝 林 非 郑欣淼

袁良骏 高 信 阎愈新

阎庆生 魏 明

· 鲁迅研究书系 ·

序 言

袁良骏

自 1913 年恽铁樵(焦木)对《怀旧》的评点以来,鲁迅研究整整走过了 80 年的路程。80 年来,学者辈出,论著汗牛充栋,鲁迅研究已成为与“红学”比肩的“显学”之一,成就斐然。

然而,不必讳言,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鲁迅研究,曾受到过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庸俗社会学和政治实用主义一度过滥,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引入歧途。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大鲁迅研究工作者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认真清算了“四人帮”对鲁迅的神化、篡改和歪曲,鲁迅研究理所当然地和其他学术部门一样,恰如枯木逢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化、开拓、创新与突破。与此同时,宝岛台湾也解除了对鲁迅著作的禁

令,诸多学人建言立说,踊跃努力,正在为“鲁迅学”开拓新生面。90年代和世纪之交,海峡两岸乃至世界范围的鲁迅研究,必将呈现更加生动活泼的面貌。

“鲁迅研究书系”承前启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编辑出版,它是80年代鲁迅研究的总结,也是90年代和世纪之交鲁迅研究的开路先锋,它将在鲁迅研究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鲁迅研究书系”共收入专著、专书15部。除关于鲁迅小说、杂文的二三专著外,偏重于论述鲁迅的文化背景与创作思想,表现了较强的理论概括性。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15部专著中有11部出于中青年学者之手。它充分展示出:中青年学者已成为鲁迅研究的中坚力量。我们深信90年代和世纪之交将是中青年学者纵横驰骋的年代,这正是鲁迅研究的希望所在。

鲁迅是中华民族不朽的伟人,也是20世纪不可多得的世界文化巨匠之一。像莎士比亚一样,鲁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就此而言,这套“鲁迅研究书系”不过是滔滔无尽话题中的涓滴而已。但愿它能成为人们珍爱的晶莹的涓滴!

1992年9月26日初稿

1995年5月16日改定

序言：“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钱理群

乾坤来信让我为他的《鲁迅的文化价值观》作序，却先发表了一通关于“序”的高论：“在咱们中国，序言问题是一个社会棱镜。我有几次侃大山的时候，曾谈到要在60岁之后写一本序言社会学。这里边实在有太丰富的世界。我过去曾经发誓，我写书决不请人作序，没有想到，第一本独立写成的书就说话不算数，并且至今不后悔。想是理智之外，人身上确实还有一种别的力量支配自己，别的人是怎么一回事我管不了，但我敢说支配我自己的是一种寻求心灵交契的需要与动机……”。我想，我是能够体会乾坤的“意思”的：我自己独立写的书，至今就没有请任何人做过序；但我也确实渴望着“心灵的交契”，不仅与研究对象，而且与同行、不同行的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文学研究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话”。

从写“序”也应是一种“心灵的交契”的理解出发，乾坤选中了我来为之作序，大概是有道理的。记得近四年前，一位年青朋友转送来乾坤的一大叠原稿，我初读之后，即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有时甚至感到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但个中缘由，却也说不清楚。这回，读了乾坤来信中的一段自白，才突有所悟。乾坤说他：“拟写一篇‘卖大米者和为他安排节目者’的后记”；因为至今尚未见到这篇后记，就姑且抄他信中一段话，以略见其“大意”：“不知您前年春节晚上看了一个题为‘卖大米’的小品没有。我之于鲁研界，就象卖大米的人之于音乐界。我知道，我的‘研究’似乎还能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全在我是一个陌生人，而且用非音乐语言喊了几声‘卖大

米’。如果此书能出,也许是最后一声叫喊,名符其实的旋生旋灭也。我进不了音乐宫。这一方面由于我只有这样一套发音系统,不堪造就,二方面也由于我喜欢这样。不过我自信有一点自己比卖大米者强,就是我觉得一些:叫喊与音乐尽管有文野之别,但内在气质未必就是两个东西”。乾坤“文野”之论,算是说到了点子上:我自己的研究,大概与乾坤一样,对于“正规”的“鲁迅研究”,都属于“野路子”,即乾坤所说,是“卖大米者”。——其实,岂只我们两人,确有一批这样的“卖大米者”,不断发出不和谐音,搅得鲁迅研究界颇不安宁,使得一些乾坤来信中所说的“正宗理论家”大为恼火,却又无可奈何。这有什么办法呢,鲁迅原属于“大众”,绝非少数人所垄断得了的。我常说,鲁迅不是那类书斋、艺苑里的纯文学家,他是直接影响人的心灵,进而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发生作用的,民族灵魂的体现者与塑造者,因此,他永远是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我们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没有把鲁迅当作供鉴赏的“古董”,或者纯学术的研究对象,而是带着来自人生的种种苦恼,困惑,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的。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从鲁迅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过程中,慢慢对鲁迅其人其文有了自己的深切体验,产生了各种想法,积累多了,由于某种机缘,把它说出来或者写成文字,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叫做“书”的东西。至于说(写)出来的这些话是否符合某种既定规范、结论,我们是从来不曾考虑的;人们承不承认它是研究成果,学术著作,对于我们,原也是无所谓的,所以乾坤说:“文苑里的正宗理论家将怎样看我的这个东西,从来不是我所关心的,但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上的对话,这却是我所害怕的。当然,退一步说,它即使成了废纸,我也无所遗憾,因为我毕竟没有阉割自己地抒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一番近乎奢侈的精神享受”——这些话,这番心情,这种态度,在某些人看来,大概又是“大逆不道”的。但世界如此之大,就有这么一些人这么想,而且这么说,这么做了;“书”出来了,就成为一个“社会存在”,再也抹煞不了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的

“心灵的对话”，自然，也会有人不舒服，甚至跳脚，骂娘，不管怎样，某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么被打破了，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放声一笑：哈！——这确有点近乎“泼皮”；但正如本书第六章“审美注意中的期待”里所说，“泼皮”在鲁迅眼里，也是“美”的，是一种“恶”之美，它的“价值底蕴是人的自由自觉”。说老实话，我们身上幸存的这股“野”气，这点“泼皮”精神，还是从鲁迅那里“学”来的。

而且，我们自己正为“学”得太晚，“学”得太不到家而自悔与自愧。无可讳言，我们（我，乾坤，以及同时代人）都曾经是“驯服工具”，我们先天不足之处，正在于我们长期缺乏鲁迅的“自由自觉”意识，即使在开始学习鲁迅时，也不习惯于独立思考，让别人的“野马”任意践踏个够，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尤其如此；我不想否认，甚至还一度迷信过姚文元这样的骗子“权威”。后来，还是“生活”教育了我们，使我们看出了骗子们的破绽，才下决心直接去读鲁迅的原著，于是，惊喜地发现了另一个“鲁迅世界”，一个与别人告诉我们的完全不同的“鲁迅”。正是这种“上当受骗”的屈辱感，促使我们下大力气，更加深入地去钻研、琢磨鲁迅的每一篇著作。正如乾坤在本书“导论”里所说，我们逐渐发现，对于鲁迅必须有一个“总体结构性的把握，离开了结构的只言片语也许是绝对真实的，但可能是绝对谬误的”；乾坤把他这本书的任务规定为：“以鲁迅大量的事实经验为材料，分析其价值判断，进而理出其价值系统，归结出该系统中的轴心所在；同时还要进一步追问其本体论根据”，正是一次自觉的努力。这是真正的“正本清源”，也如乾坤自己所说，它的“最原初动机之一”，就是“以一种结构性的还原来报复‘文革’对我的欺骗，洗刷由无知而蒙受的耻辱”。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乾坤的书是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本书专门引述过这篇文章）所说的“血的蒸气，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由此而形成了本书在外在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如不厌其烦地大量引述鲁迅的原文之类，更在内在气质、行文风格上，涂上了浓重的“论战”色彩——对

别人的不同观点，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对自己曾经真诚相信过的“谬误”，则是痛定思痛的理性反思。每一个论断背后，其实都包含着“血”的教训与“真”的觉醒的（恕我不一一举例）。正因为如此，对任何继续“拉大旗做虎皮”，以新的旗号贩卖旧的谎言的勾当，就有着天生的敏感——这些谎言对这一代人是太熟悉了，要瞒过他们是不可能的。而作为对新、旧谎言的一种报复，一些更年青的（还有一些并不年青的）朋友，对鲁迅产生的种种“误解”，也同样使这一代人感到不安。从本书对当代某些“鲁迅观”的讨论中，人们不难看出其中的隐痛与无奈。当然，内心深处的愤怒却是隐隐指向那些新、老“骗子”们的。——本书的作者显然有意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他时时警惕着不要让“情绪”影响了论断的科学性。因此，乾坤最后写出的这本“书”，已经从作为“原初动机”的屈辱感、报复欲求中摆脱出来，升华为一种科学的理性。在这方面，作为乾坤“本业”的哲学研究工作的学养，帮了他的大忙，使得本书既有一种内在激情的“力”，又处处显示出“哲学性玄思”的清明。看来，一个“非文学者”的介入，是有他自己的特殊“优势”的。

因此，乾坤期待于我的“序”的，原也是一种理性的“批判”，而我却说了这么多带感情的话。也许是我与乾坤心灵的契合处太多的缘故；从这个角度看，我又不是一个理想的“序”的作者。不过，乾坤可以放心，对本书（以及相类似的我的著作）真正理性的批判性的审视（自然不是那种粗暴的非理性的“审判”）是会出现的——在鲁迅研究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自己也是“中间物”，这是不言而喻的，乾坤说过，他是偶然地闯入鲁研界，现在书写出来，就没有他的“事”了，他要回到自己的本行；我也早已申明要“自动隐去”：我们又是如此的一致，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

1992年7月3日写于北京酷热中

目 录

序言：“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钱理群）	
.....	（1）
导论.....	（1）
第一章 “僵尸的乐观”与“活人的颓唐”	（19）
一、一扇窗口.....	（19）
二、入世、乐观何以为僵尸	（24）
三、死的颓唐与活的颓唐.....	（29）
四、“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35）
五、吃人问题.....	（38）
第二章 出世与入世：儒者柔也.....	（45）
一、反智主义.....	（45）
二、精心提炼的符号.....	（50）
三、廊庙山林之间.....	（54）
四、胡适们.....	（57）
五、周作人们.....	（62）
六、“温和”的还原.....	（70）
第三章 大众观中的文化统觉	（79）
一、麻烦.....	（79）
二、标准问题以及鲁迅与马克思.....	（87）
三、阿 Q 不争什么	（93）
四、罗素、伏尔泰、梁漱溟	（100）
第四章 精神的家园.....	（110）
一、孤独者	（111）
二、独异的代价	（117）

三、独战的悲哀	(124)
四、儒道佛耶及存在主义	(129)
第五章 人格自塑	(142)
一、职业人生孰体孰用	(143)
二、要“名人”，还是要“自己”	(148)
三、修身	(155)
四、生存与死亡	(165)
第六章 审美注意中的期待	(174)
一、美与价值	(174)
二、鲁迅注意什么	(179)
三、“人为美”与“美为人”	(183)
四、“我不爱江南”	(186)
五、在悲喜剧的背后	(192)
六、“真诚”的意义	(197)
七、历史与审美	(204)
第七章 女性的发现与人的发现	(211)
一、两性道德及其艰难的践履	(211)
二、“孝”与母爱	(221)
三、性与人	(231)
结束语 宽容	(247)
附白	(258)

导 论

(一)

1987年，我琢磨着写作这本小书，于是向一家出版社打听行情。一位好朋友认真地劝我说，有关鲁迅的话，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何不另辟蹊径呢？

我自然感激朋友的好意的，但我终于没有听进他的忠告。一是我已“情结”在脑，不易排遣；二是对他的“差不多”的话，我有点儿不以为然。

人文学科的所谓研究，简略地说来，我想不外乎这样两种学术活动，第一是史料的考据，文献的纯技术性注疏；第二便是所谓“释义”。第一类工作虽然也包含释义，但本质上是忠实地给对象以事实的还原与复制；对鲁迅的这类研究也许可以穷尽罢，但现在是不是差不多了，我无由得知。而第二类工作则是无需翻阅文献就能知道的，因为对一种思想对象的释文性研究是不可穷尽的。

鲁迅已经作古，其文本固然可以说是一个稳定了的，自足的存在。但文本之为文本，就在于有释义者；而任何释义者都必然地是历史的人，都无法消除自己的历史相对性和实践价值观。历史是无限的，释义主体是无限的，所以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对一种文本的理解与释义，永远不会差不多。这就是孔夫子、柏拉图被解释了两千多年，至今仍没有“差不多”的缘故。不是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孔夫子么？他去我们不过半个多世纪。

有人说，几十年来在鲁迅研究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文学界投入了最精华的力量。我是极以为然的。那么，我明明知道鲁研界以往大师璀璨，而今名家云集，为什么却还要不知高低地闯进这片领

地？这不是自找没趣么？

这是因为在我的字典里，学术研究并不是打擂或比高低。我以为后人能在前辈学者的话题中再说些什么，最大的根据并不全在其功力和资料拥有上优于前人，而在于其与前辈的历史间距，在于其拥有他这一代人或他自己特有的社会关系、生活体验、智力、性格、气质、情感等等及其构成方式。一句话，拥有自己的心理视界，所以后人可以在知识才力不能望其前辈项背的情况下，靠他们独有的心理统觉同被前人咀嚼过一遍又一遍的文本对话，沟通，共振，发表“我之鲁迅观”。如果不是这样，在文革中长大的因而先天不足的我等这一代，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在里程碑式的鲁研大家之后问津这片土地，何况是更等而下之的我。

经过这样一番立足点的自我推敲之后，我便鼓起勇气，按照自己的程序干了起来。我曾就一些阶段性结果求教于文学界、哲学界、史学界的前辈和朋友，得到的多是鼓舞与鞭策。无疑，这成了我克服倦怠，写完此书的重要杠杆。

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偶尔听到一种关于“我之鲁迅观”的议论：如果大家都从各自的视野看鲁迅，岂不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还有何客观性可言？这种担心出于对鲁迅的善意自不待言。然而我很纳闷，不知道这种假言结论怎么推出来的：科学研究与审美接受当然不是一回事，但同样必须依靠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才能进行，怎么讲我之鲁迅观就没有了客观？离开了人的能动的主观去研究客体，那是可能的么？几十年鲁迅思想的新认识，难道不是依赖于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的“我”观出来的么？如果每一个我都不去观鲁迅，客观的鲁迅宝藏交由谁来开采？如果大家都不去“观”，就像大家熟知的年月那样只由某几个人去垄断解释权，会有“客观”的鲁迅么？况且，那少数几个人不也是一个个“我”么？

还有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派生问题也使我很是费解了一阵子：大家都谈我之鲁迅观是否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据我所知，相对主

义与相对的“多”无缘；相对主义之所以为相对主义，在于它否认相对的客观属性、绝对属性；正因为如此，它滑向了另一极，把相对绝对化。只要不是这样，相对倒是越多越好，因为一个个相对分别从一个个侧面、层面掀开客体的一扇扇窗页，因而都是向客体的接近（当然不能合一）。既然说鲁迅思想中未知的世界还很多，多一些侧面去观察岂不是更好么？其中有些“观”完全有可能是错觉与歪曲，但是难道纠正一种错觉与歪曲，不是靠另一种我之鲁迅观么？

这种善意的但无济于事并且终于不期然而然滑入自己防范的沼泽的情况，使人很容易想到我国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

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不喜欢相对，即便像提出过“天人相分”这样的命题的、多少有点特别的荀子。他曾经正确地指出先秦诸子滞于一隅之蔽：“……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于蔽于法而不知贤，申于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①为了“解蔽”，他要人充分发挥心的作用，“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虚壹而静”，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是，从运作上讲，一个人超拔自己的历史性与生活情境怎样才有可能做到？比如墨子如何才能兼有诸子之知而无蔽，即便他做到了，他又如何能解诸子之蔽而统摄后人，“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认为依靠心态的“大清明”或道的“心术”等，可以使人不“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做到“出令而无所受令”。不过，我们没有看到先例，道家没有做到，“集大成”的他也没有做到。他在批评诸家之蔽后，独许孔子得道之全。即便如此罢，这“仁智且不蔽”的儒道之全，也不过是一家之全。中国历史上“明于大理”的“圆而神”，“不滞于物”的虚壹而静，仍然是一种蔽，如果它本身终极无蔽，怎么有“方以智”相伴相依和后来的科学民主运动呢？而荀子，我们也许可以在他列举的一系列诸子之蔽后帮他加一句，那就是，他多少太蔽于“大理”而轻看了“一曲”。他以解蔽始，却以无可逃避的蔽终。以

① 荀子《解蔽》。

至到今,还要我们来帮他解蔽。

为了“解蔽”、无数的思想家耗尽了心血,今天想来还令人肃然起敬。同荀子一样,他们无一例外地失败了。他们给后人留下的并不是终极无蔽,而是一系列闪光的相对、有限。这是历史对人的捉弄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智能匮乏么?都不是,这是因为他们首先自设了一个两难陷阱。虽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对无蔽、无限的探究中种瓜得豆地为人类贡献出一些伟大的有限,但就其原初动机而言,失败是注定了的。这就像无论什么样的大力士,都不能举起自己离开地球毫厘一样。

19世纪中叶,一种纠正终极说而又叫做“无片面性弊端”的学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产生了。然而这种学说的无弊端,恰恰在于它否定了前此思想家的无弊端自诩;它用“暂时”、“过程”、“中介”概念理解无限的自然界、人类精神和精神现象;它纠正了黑格尔过程观念的不彻底性,不仅以此描述外部世界,也用来界定自身;它把认识主体理解为从事历史实践活动的人,因而认为一切具体真理都有历史相对性。用我们这里的话说,都是有所屏蔽的。

(二)

我所以纳闷再三,并且一开场就似乎无边际地唠叨了这么一大段,固然是想借此向读者交代我是如何一步步敲定自己的立足点的;但更重要却不在于此,而在于它牵涉到了一个对本书来说至为关键的问题,即我对鲁迅思维方式的理解。思维方式是一个人展开他全部生涯的内在轴心或枢纽,从释义的角度讲,它又是研究者把握研究对象的锁钥。本书立足点的敲定,曾受益于鲁迅的思维方式;本书的写作准备、立意乃至结构逻辑都是由此而来。因而不论从哪个意义上,它都必须以阐述鲁迅的思维轴心为引子。

能构成一个思想者思维轴心的,是他对于世界本体的理解。在思想史上,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局限与全面,一曲与大理,环节与总体,相对与绝对,共相与殊相,一与多,体与用,道与器等等

一系列的说法,常常被用来从不同的向度描述世界本体的二重性质。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最根本的是他用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的思想家素有发达的直觉主义传统,通过具物而直切宇宙本体的智慧连一些杰出的西方大哲也感叹不已。读鲁迅的书,尤其是它的散文诗,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种东方智慧。但是与中国古代思想家能动地发展直觉能力的同时,却把历史的环节的概念浑沌归一的作法不一样,他很有限地处理了直觉的效用范围。他把世界的本体既不理解为圆而神的浑沌,也不理解为周而复复的连续,而看作无限发展之链与中间环节的对立统一:世界是无限进化的,发展的,而不只是由一个个孤立的循环圈组成的无穷序列,这种无限是由有限的中间物来组成的。所以他从不在有限之外追求无限,片面之外追求完满。“一切都是中间物”,“无论什么都是有弊的”,之类的话鲁迅说过不少,都分别是从这一思维的轴心出发的,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本体的描述。

也许可以这样说,鲁迅的全部生涯,都是在这思维轴心参与下辐织而成的。

鲁迅一生都在对普遍、永久、全面、无弊嘲弄,而似乎刻意追求着一种被人目为偏颇的选择。一些论者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激愤”,当然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追问一下:怎么理解他在不激愤,甚至在检讨自己“峻急”的同时,还在为自己的激愤意见作冷静的辩护(参见第一章)?不是说他第一是冷静,第二是冷静,第三还是冷静么?那么怎样理解一个总是冷静的人又总是都在心血来潮呢?我们也许可以“亦此亦彼”的辩证术将其演绎为理性的冷与情感的热,可是这里并不涉及他的情感世界而只是讨论他贯串终生的理性判断方式。

还有一些论者从方法论角度把鲁迅的这种态度理解为矫枉之术,应该说也有道理。不过,方法总是一个派生的问题,正像人们矫枉一块铁条,必须有对铁条的物理属性的了解为理知前提一样。没